

从社会大众的政治心态看民本思想的文化功能

张分田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 在中国古代, 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这种全民性的政治文化植根于社会大众所共处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 形成若干体现社会政治基本特征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心理, 发挥着多方面的政治文化功能。主要有政权认同与角色认同功能、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功能、政治评价与政治批判功能和政治调整与改朝换代功能等。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维护君主政治模式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 民本思想; 社会大众; 政治心理; 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大量事实表明: 在中国古代, 民本思想是主流政治文化。战国秦汉以来, 民本思想在统治思想、官方学说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①这种全民性的关于君主制度的理念、价值、态度、信仰、感情, 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理想、政治取向、政治要求、政治行为。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为又反过来影响着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文化。群体政治心理支配下的群体政治行为还会对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侧重分析民本思想对社会大众政治心理、政治行为的影响及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政治文化功能。

主流政治文化是政治共同体所具有的政治理论、政治性格、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一系列的研究都证明, 不是在个别人、恰恰是在群体出场的情况下, 主流政治文化的特点才能表现得最清晰。这种政治文化往往具有全民性, 它超越地域、族群、阶级、等级、职业、学派, 塑造着共同体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政治心理特征。这种全民性的政治文化植根于社会大众所共处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 形成若干体现社会政治基本特征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心理。归根结底, 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关系共同性的产物。它又为维护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发挥着多方面的政治文化功能。

主流政治文化最具有完整性, 这既来自于它的普遍性, 又成就了它的普遍性。换句话说, 主流政治文化之所以成为主流政治文化, 是因为它包容着一种既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所必需的一切政治文化要素, 并可以为生活在这种秩序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群提供文化上的行动指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在政治生活中, 民本思想发挥着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 它

^① 实际上, 只要指出儒家学说长期居于主流学术乃至官方学说的地位这一事实, 就足以证明民本思想始终是官方学说、统治思想和主流政治文化。为了进一步证明民本思想的这一属性, 针对一些广为流行的学术观点, 笔者写过一组文章。主要有: 《论“立君为民”在民本思想体系中的理论地位》,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民贵君轻”再解析——略论“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 《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略论先秦法家规范君权的政治思想》,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从全社会普遍意识的角度看秦朝统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因素》,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六卷, 2006年。

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有深刻的影响。

一、民本思想的政权认同与角色认同功能

民本思想设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可以概括为：立君为民，圣贤治国，君主必须施政养民，安定天下并获得民众的拥戴。这种思想具有明确君、臣、民等级结构，规范君、臣、民角色关系的功能。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支配下，社会大众的基本倾向及相关的政权认同与角色认同是：非常情况下的“思归有道”与通常情况下的服从朝廷。

在政治动荡的非常时期，大多数民众有一种自发地乃至自觉地“思归有道”的政治心理。这种现象以改朝换代之际最为显著。兹举一例。两汉之际，群雄并起。成丹、张印等人自恃人多势众，皆曰：“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归心汉家的王常不以为然。他指出：正是由于民心思汉，而王莽“积失百姓之心”，群雄才得以乘势而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以秦、项之执，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泽？以此行之，灭亡之道也。”^①王常的政治认知与儒家民本思想相契合。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下，同一军事团体的头目们经王常劝说，接受了这类思想，并付诸行动。

在中国古代的政论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分析：广大民众总是皈依王权、思归一统的。张玄素对唐太宗讲的一番话很有典型性：

臣又观隋末沸腾，被于宇县，所争天下者不过十数人，余皆保邑全身，思归有道。是知人欲背主为乱者鲜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于乱。陛下若近览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能加。^②

这就是说，绝大多数臣民始终自觉地扮演着王权顺从者的政治角色。造成这种现象的文化根源来自广大民众对君主制度和自身角色的政治认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朝廷、君主的情感。

在通常情况下，社会大众基于民本思想而形成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感情主要体现为王朝认同意识，即对一个王朝的拥戴、支持与顺从，并提供政治文化研究所谓的“服从性支持”（或“顺从者支持”）、“政治资源的支持”乃至“要求”。^③广大民众与朝廷的关系大多属于服从性支持，即提供物质支持，如完粮纳税，承担徭役等；服从法律、规章，如遵守王法，服从官长等；对政治权威及其象征表示敬畏，如敬畏皇帝，崇拜王权等。在特定情景下，广大民众也会为自己所拥戴、服从的王朝提供政治资源的支持，如在外敌入侵时，主动援助，积极参战等。皇帝与朝廷往往依据民本思想制定相关的权威性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实施。这就构成了君主与臣民的基本互动模式。社会大众的王朝认同与角色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使一个王朝的统治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心理、共同的政治经历等很容易形成大体相似的个体的认知与感悟。生活在君主政治条件下的人们很容易形成与民本思想息息相关的政治认知。在人际互动中这种认知可以广泛地扩散。在这一点上，切忌低估华夏

^① 《后汉书》卷一五《王常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版，第578页。

^② 《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一版，第2639页。

^③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10-13页。

先民的群体性的政治智慧。

政治心理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心理因素。就社会大众而言，民本思想的主要功能是铸就具有普遍意义的臣民心态及相应的取向、态度、信仰和情感。政治稳定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政治心理因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起着维系政治体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政治心理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倾向，往往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影响整个社会的行为、活动、组织模式和制度建构。社会大众的臣民心态是一种深层结构的政治心理，它对保持君主政治的稳定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二、民本思想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功能

依据民本思想的制度设计，惟一有效的利益综合途径是依赖朝廷，企盼明君，仰仗清官，借重循吏。在政治生活中，民众只能被动地选择皇权与皇帝作为自己的庇护人，从而形成典型的“统治者兼庇护人—被统治者兼被庇护人”的模式，即由“天下之父母”充当全社会的利益综合者，并为广大臣民提供保护及各种公共性服务，而广大臣民则自觉地或被动地为皇权提供劳役、赋税及其它的政治资源并顺从既定的统治秩序。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全社会存在共识，并形成相对和谐一致的政治文化，因而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为保持整个社会政治体系的稳定提供大众化的政治心理基础。

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下，统治者都宣称为人民谋利益，自诩为民众的救星。作为中华帝制的统治思想（官方学说），民本思想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思想，它明确规定君主必须以切实的行动体现“立君为民”的设君之道和“政在养民”的为君之道。因此，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各种重民政策原则，诸如轻刑罚、薄赋敛、使民有节、取民有度等。这些重民政策原则以治国之道、为君之道的形式间接地表达了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还提出比较系统的君主规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调节君、臣、民利益关系的功能。在历代朝堂议政中，很容易找到依据民本思想讨论、制定、修订治民政策的事例。相关的重民政策大多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民众的利益。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民众的利益表达通常以王朝的言路机构为中介间接地上达君主。尽管允许臣民以某种形式进行有限的利益表达，诸如申诉疾苦、控诉冤狱等，而普通民众却很难通过合法渠道和专门机构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更不容易将这些要求转换为权威性政策。因此，非程序性的聚众反抗往往是民众利益表达的最有效的途径。一旦民众大规模揭竿而起，王朝覆灭就指日可待了。民本思想之所以可以成为统治思想、官方学说，主要是出于对这种现象的深刻反思。这类反思的结果以民本思想的形式体现在统治理念之中，它可以曲折地表达广大民众的利益与要求。在通常情况下，统治者也会制定并贯彻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政策。许多新兴王朝还成为农民起义政治遗嘱的执行人。汉初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贞观之治”最为典型。大多数新兴王朝或“中兴之主”都会推出成系列的重民政策，并以民本思想作为制定这些政策的主要理据。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一定程度的利益综合功能的民本思想及相关的重民政策往往可以推出“某某之治”。中国古代的王朝盛世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

三、民本思想的政治评价与政治批判功能

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直接支配着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使之形成群体性政治心理结构及相应的政治行为模式。群体性政治心理结构包括一个社会群体共同的政治理想、政治目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等。政治目标是政治群体在一定时期想要达到的政

治境界和标准，它往往有浓厚的理想色彩并与政治价值息息相关。这种目标是政治群体参与政治活动的内在动力。

政治评价与政治批判是民本思想的主要文化功能之一。甚至可以说，民本思想既是政治评价与政治批判的产物，又是政治评价与政治批判的依据。它主要以政治理想、政治价值的形式存在并发挥其政治功能。

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是政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政权倾向模式、政策倾向模式的核心是人们的政治理想，而政治理想通常作为政治价值成为人们评价政治制度、政治权威和政治活动所依据的标准和尺度。政治理想、政治价值具有明显的规范性。对于政治制度、政治权威和政治活动，政治共同体总是以一定的政治规范为尺度进行衡量；作为政治共同体构成要素的个体，也总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来估价自己的政治动机、政治目的、政治选择、政治行为，来评价种类繁多的政治现象。

有尺度、有规范必然有评价、有批判。尺度与规范越严格，评价就越频繁，批判就越激烈。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通常以“王道”的面目出现。社会大众常常用以衡量一个王朝、一个君主是否达到“王道”的标准以及与这个标准有多大差距。作为道义评价的尺度，人们常常依据民本思想将君主判分为“有道”或“无道”、“尧舜”或“桀纣”。在王朝更替之际，这一类的评价与批判往往汇聚成波澜壮阔的伴随着武器批判的社会政治批判思潮。

评价与批判的场合有朝堂与民间之别。历代统治者以民本思想作为官方学说，他们有意有目的地造就了一批有责任感的通晓民本思想的精英人物。这些人把忠君报国、为民请命视为忠臣义士的要素和义务。他们有参与朝堂政治、推动政治调整的强烈动机。因此，许多评价与批判发生在君臣议政之时。例如，贞观四年（631年），唐太宗下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张玄素上书谏阻，曰：

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

他的主要依据来自民本思想，即“天下不可以力胜，神祇不可以亲恃，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终如始，可以永固。”唐太宗问道：“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唐太宗从善如流，中止营修，并“赐彩二百匹”。侍中魏征叹曰：“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①在历代君臣议政中，类似的事例并非罕见。

很多帝王鉴于历史教训和亲身体会，深知民是“治乱之本源”，并把舟水之训奉为座右铭。他们也曾依据民本思想抨击暴政，痛斥暴君为毒蛇猛兽。这种言辞激烈的政治批判在历代君臣论政中并非罕见。唐太宗便是典型一例。《贞观政要》等文献记载了唐太宗君臣对隋朝政治的全面、激烈的抨击。在《金镜》一文中，唐太宗指名点姓地抨击了桀纣厉幽等一批“临危之主”。他说：“观夏桀、商辛，嗟其悖恶之甚，犹时令不行，寒暄失序，则猛兽肆毒，螽螟为害。夏桀、商辛，岂非猛兽之俦乎？”唐太宗列举了历史上一系列无道之君的弊政，认为“乃是君之过也，非臣之罪也。”他把历史上的圣王与暴君、成功与失败一一加以比较，并引以自戒，所谓“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懔懔然兢惧，如履朽薄。”^②深刻的批判、认真的反思、清醒的自戒对唐太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有重大影响。他以秦汉暴君及隋亡之辙为殷鉴，施政治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终于成就了“贞观之

^① 《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第2639-2640页。

^② 《唐太宗集·金镜》，第121-12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治”。

有些皇帝还曾依据民本思想自我评价乃至自我批判。“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①“禹汤罪己”是著名的圣王故事，也是公认的帝王规范。每当出现重大政治失误，皇帝往往下诏罪己，而“失德”、“无道”原因大多与有悖民本思想相关。汉文帝的“罪己诏”堪为典型。汉唐以来，政事罪己诏屡见不鲜，诸如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以及唐德宗为朱泚之乱、唐代宗为藩镇之乱、宋徽宗为金兵入侵而发布的罪己诏。皇帝因政事罪己的基本思路是：“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②。“皇穹以朕为子，苍生以朕为父”，因而理应“劳怀罪己之念，延想安人之策”。而今“刑政不修，惠化未洽”，有违天心人欲，必须自认“薄德”，不符合“人主之用心”^③。

影响较大的评价与批判大多来自思想家。先秦诸子大多是依据民本思想抨击暴君暴政的著名代表人物。孔子及其传人抨击“天下无道”，认为“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④。在他们看来，当今诸侯多为“率兽食人”^⑤之辈。老子及其传人把许多公认的圣王先贤视为祸乱之首，对各种扰乱民生、有悖人性的有为政治进行了尖刻的抨击。墨子及其传人把许多君主视为“独知爱其国”^⑥的“自爱”、“自利”之人，对桀纣之类的暴虐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商鞅批评许多君主违背了“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的圣王之道，指出：“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⑦韩非反对“伤民”、“虐民”、“黷武”，抨击“人君无道，则内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邻国”，导致“民产绝”、“士卒尽”^⑧。《吕氏春秋·振乱》抨击“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愬”，进而认定“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

汉唐以来，历代著名思想家，无论在学术上属于哪个学派，在政治上属于何种身份，都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君主做出过评判与批评。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古往今来，乱世多，治世少；乱君多，贤君少。诸如《新书·数宁》：“自武王已下，过五百岁矣，圣王不起，何怪矣！”《抱朴子·嘉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治世少而乱世多耶！”《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潜书·鲜君》：“上观古昔。尧舜禹启，治世惟久。夏、殷、西周、西汉，治多于乱。……其余一代之中，治世十一二，乱世十八九。”总而言之，“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了其生也久矣，其如彼为君者何哉！”在古代文献中，这类判断很常见，其主要依据之一是民本思想。

在特定政治情境下，思想理论上的批判往往汇聚成一股影响广泛的思潮。东汉末年的政治批判思潮、唐朝末年的政治批判思潮和明清之际的政治批判思潮等都是典型事例。这种政治批判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主张立君为民、为公、为天下的民本思想。这些思潮又反过来推动了民本思想的理论进展和政治实践。

由于民本思想具有“君为政本—民为国本”理论结构，因此在思想家们的政治批判中普遍存在着结构性的政治选择困惑。“治世少，乱君多”的判断展示了民本思想所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但是，既然看到“治世少，乱君多”，就应当放弃这种政治制度。可惜的是，信

^① 《左传·庄公十一年》，《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版，第1770页。

^② 《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版，第429页。

^③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77页。

^④ 《孟子·公孙丑上》，《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36年，第一版，第109页。

^⑤ 《孟子·滕文公下》，第269页。

^⑥ 《墨子·兼爱中》，《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36年，第一版，第64页。

^⑦ 《商君书·修权》，《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36年，第一版，第24页。

^⑧ 《韩非子·解老》，《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36年，第一版，第106页。

奉民本思想的人们的政治思维总是沿着两条看似自相矛盾的思路展开：一方面把各种权威奉献给圣王、君主，树立起一种理想化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又为这个权威设置了极严格的规范，还往往对其进行激烈的抨击乃至斥之为罪恶。以唐甄为例，他在高喊“帝王皆贼”之后，又用大量篇幅设计为君之道。就连宋元之际的邓牧、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也有类似的思路。惟君是瞻，这可以称之为“尊君”；惟君是责，这可以称之为“罪君”。“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①。这种思路势必落入“尊君—罪君”政治文化范式。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尊卑等级分明，贫富差别明显，一方面是“一身万椽家”、“一口千仓粟”，另一方面是“贫者无室庐”、“贱者饿无食”。一遇天灾人祸，就会出现哀鸿遍野的现象。广大民众食不果腹，只得蓬子为面，槐叶为齏，甚至易子而食，折骨为炊。因此，社会各阶层多有抨击暴政、批评现实的言行。在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局面动荡的时期，这种现象尤为引人注目。

烈度最强、影响范围最大的当属王朝更替之际广大民众的政治批判。这类政治批判大多将思想的批判与武器的批判交织在一起。《尚书》、《诗经》在记述商末政治形势时，使用了许多令人惊心动魄的字眼。诸如“小民方兴，相为敌仇”^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③。在社会大动荡中必然有个体或群体的政治批判。由于文献阙如，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西周、春秋时期的政治讽刺诗表明，人们由于对现实政治不满，把怨恨和谴责泼洒在天、祖、王之上，多有怨天、骂祖、斥王的言辞。民众政治批判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如赏罚不公、内宠乱政、信馋拒谏、徭役繁重、滥用权力、不劳而获等。当时还流传着“兽恶其网，民恶其上”^④的谚语，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民众的反抗心态。此后，每逢王朝末世，都会有群体性的民众批判思潮。

群体性民众批判思潮的主要依据也是民本思想。在特定政治情势下，揭竿而起的人们往往借助与民本思想息息相关的“汤武革命”论而发动类似于社会动员、革命动员的行动。它可以有效地解构既定的君臣关系，使人们从“君臣之义”的精神束缚中解脱出来。历代王朝更替之际都会有这一类的现象。祖君彦为李密草拟的反隋檄文堪为典型。

李密举兵反隋，命记室祖君彦“作书以移郡县”。这篇声讨当朝皇帝的檄文，历数隋炀帝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堪称中国古代史上“罪君”文字的范例之一。其所依据的标准、尺度正是民本思想。作为号召民众的檄文，它虽出自文人之手，却体现着社会大众公认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价值。

这篇檄文开宗明义，先讲了一番设君、为君之道的大纲：

自元气肇辟，厥初生人，树之帝王，以为司牧。是以羲、农、轩、项之后，尧、舜、禹、汤之君，靡不祇畏上玄，爱育黔首，乾乾终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惧。故一物失所，若纳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车而泣之。谦德轸于责躬，忧劳切于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蟠木距于流沙，瀚海穷于丹穴，莫不鼓腹击壤，凿井耕田，治致升平，驱之仁寿。是以爱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国多年，祚延长世。未有暴虐临人，克终天位者也。

在这个纲领性的段落中，包含了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即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在檄文的发布者看来，隋炀帝全面违背了公认的设君为君之道，丧失了为君的基本条件，因此他必须下台。

^① 唐甄：《潜书》上篇下《鲜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第206页。

^② 《尚书·微子》，《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版，第177页。

^③ 《诗经·大雅·荡》，《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版，第552页。

^④ 《国语·周语中》，岳麓书社，1988年，第一版，第21页。

这篇檄文以君道的细则为目，逐条开列隋炀帝的无道之举，共有十大罪状。其中有五大罪状直接涉及治民政策，即“其罪三”：骄奢淫逸，荒湎酒色，违背了“平章百姓，一日万机，未晓求衣，晡暮不食”的为君之道；“其罪四”：“广立池台，多营宫观”，导致“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使鬼尚难为之，劳人固其不可”；“其罪五”：“科税繁猥”，横征暴敛，违背“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宁积于人，无藏于府”的重民政策原则；“其罪六”：“年年历览，处处登临”，导致“尸骸蔽野，血流成河，积怨满于山川，号哭动于天地”；“其罪七”：“恃众怙力，强兵黷武”，违背“示以羁縻，达其声教，苟欲爱人，非求拓土”的圣王之道。此外，“其罪八”的“愎谏违卜，蠹贤嫉能”，“其罪九”的“彝伦攸斁，政以贿成”，“其罪十”的“志怀翻覆”、“丝纶不行”等也是君道的主要内容，间接地涉及治民政策。

接下来，这篇檄文依据“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国祚将改，必有常期”等与民本思想相互交织的汤武革命思想，断言：“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四维不张，三灵总瘳，无小无大，愚夫愚妇，共识殷亡，咸知夏灭。”进而宣称：魏公李密“属当期运，伏兹亿兆”，“顺人将革，先天不违”，效法武王伐纣，“大誓孟津，陈命景亳”，并号召天下响应，兴兵灭隋，“共建功名”^①。

在历代王朝的末年，类似的政治批判司空见惯，人们所依据的理论、所使用的尺度也大体相似。由此而引发的改朝换代思潮，以极端的方式展示了民本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即推动君主政治的自我调整。

四、民本思想的政治调整与改朝换代功能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调节理论之一。它的形成、发展、传播都与改朝换代现象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民本思想是反思、解释改朝换代现象的产物。民本思想从立君为民、天选民主、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无民无君、君舟民水等角度，全面地解读、规范君民关系，系统地论证了国家与君主贯彻实施以民为本的重民政策的必要性。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它主要为阐释王道仁政、防止王朝覆灭而设。因此，民本思想最常见的政治文化功能是调整君主政治。

民本思想调整君主政治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朝堂议政中。每当涉及治民政策和民生状况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朝臣引据民本思想，主张实行必要的政策调整。许多臣子甚至敢于谏诤君王，为民请命。谏臣魏征、张玄素等是典型事例。只要大略翻一翻《二十五史》，就不难发现这类现象司空见惯。《历代名臣奏议》可谓典型例证。历代为民请命者的具体命运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这类行为常常可以导致一定程度的政策调整。一些皇帝甚至可能下诏罪己。在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依据民本思想做出的政策调整往往幅度较大、收效明显。“成王之治”、“文景之治”、“光武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洪武永乐之治”、“康乾之治”等都是典型事例。

在中国古代，最大的政治调整是改朝换代。陈胜起而秦灭，绿林起而新亡，张角起而汉裂，黄巢起而唐倾……王朝更替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调节机制。它通过王权再造来更新政治，整个社会的面貌也会或多或少发生变化。“某某之治”大多是这种政治调整的产物。

在通常情况下，民本思想的主要功能是以警示君主的形式，寻求政治调整，保持政治稳定，以避免改朝换代。在思想家的著作中和朝臣们的谏议中，常常可以见到这类话语：如果不及时调整治民政策，将会招致王朝覆灭。马周给唐太宗的一个奏疏堪为典型。这篇

^① 以上引文见《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第2212页。

奏疏批评唐太宗违背“俭以息人”的重民政策，呼吁恢复贞观初年的做法。其主要依据是：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①

为了平息百姓的怨言，唐太宗中止了一些奢纵扰民的做法。在历代朝堂议政中，这类思路、话语与行为很常见。

既然民本思想主要为避免治民政策失误，应对民众反抗而设，又主要通过解释王朝更替来表达，那么在一定条件下它就会成为民众反抗的主要理据和思想动力。在特定政治情境下，赞同“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②的民本思想往往是推动改朝换代的精神力量。民本思想可以推动一个王朝、一位君主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而其效力因人而异，且大多不尽如人意。正如魏徵所说：“王者之兴，必乘衰乱，覆昏暴，殆天授人与者。既得天下，则安于骄逸。人欲静，徭役毒之。世方敝，哀刻穷之。国繇此衰，则守文为难。”^③民本思想赋予广大臣民在舆论上的批评权利和在行动上的不合作权利，包括解除与暴君的君臣关系的权利，甚至还赋予“新兴王者”实行“汤武革命”的权利。因此，一旦王朝走上末路，民本思想又会为推翻这个王朝提供理论依据。

在一定条件下，民本思想可以为政治危机推波助澜，甚至引发改朝换代思潮乃至庶民大规模的造反行动。每当衰世之秋，改朝换代思潮必然从潜滋暗长发展到汪洋恣肆。具有强烈政治批判色彩的思想家往往成群地涌现。朝野上下的士大夫大多相信旧朝气数已尽，或劝谏世主“与民更始”，或预言新圣已应“期运”而生，或率众举兵图谋基业，有人还草拟声讨暴君的檄文。揭竿而起的庶民大多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于是以暴力方式推动的政治调整取代了以和平方式推动的政治调整。导致这种现象的政治文化根源是与民本思想结为一体的“汤武革命”思想获得普遍的认同，社会各阶层一致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违背立君为民的设君之道和政在养民的为君之道的暴君将丧失天命，人们可以解除与他结成的君臣关系，甚至可以驱除之、诛杀之、取代之。广大民众还常常为新兴的“王者”提供政治资源的支持，诸如箪食壶浆、临阵倒戈等。

暴动与起义表达了群体性、集团性乃至全国性的被剥夺、被压迫的愤怒情绪，其气势甚至可以用星火燎原来形容。民众反抗往往带有明确政治目的，即打倒不公正的政权，改变不公正的政策。绝大多数人有共同的企盼，即建立符合王道的新时代。在这类武器的批判和激烈的调整中，是否符合并贯彻民本理念是其要件之一。甚至可以说，这类行动的根本诉求是：打倒违背民本理念的政权，重建符合民本理念的政权。广大民众以暴力形式表达利益诉求的行动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因此，新兴王朝大多会自觉地大幅度调整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民本理念。

但是，否定暴君暴政并不意味着否定君主专制制度。新旧交替之际，广大民众总是“保邑全身，思归有道”^④，弃旧君而拥新君。贾谊《过秦论》：“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打着民本旗号的“革命”不是以一种新的秩序取代现存秩序，而是努力使政权符合自身的修饰。因此，它不是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变革，只是一次公共秩序的调整，并不能导出真正的以民为本的政治。臣民永远是臣民。在民本思想制导下，社会大众的政治选择只能在不同的君主之间有所取舍，因而只能导致新的政权认同，而不可能导致新的角色认同。由此

^① 吴兢：《贞观政要》卷六《奢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版，第208页。

^② 《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36年，第一版，第255页。

^③ 《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391页。

^④ 《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第02639页。

可见，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维护这种政治模式的精神力量。

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性政治心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大多数人对特定的政治共同体的一般特征（诸如政治制度、政治权威、政治构成、政治关系、政治活动等）的大体相似的反映。它又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引导和强化的结果。深层次的群体性政治心理结构具有积淀性、稳定性和无意识性等特征。它植根于人们灵魂深处的政治心理结构，无时不在地左右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使社会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政治倾向、高度一致的政治文化，显示出相对稳定的“意识-行为模式”。从社会大众政治心态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性政治心理。在全面评估其历史价值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The Cultural Functions of Minben Reflected in the Mass Political Mentality

Zhang Fentian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the fundamental thinking of *minben* had been widely accepted by all stratum of the society. This kind of nation-wide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was grounded i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political institu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traditions that was shared by the mass, had generated many common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political mentality that embodied basic social and political features, exerting various-face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mainly the function of regime identification and role identification, function of interest expression and interest synthesis, function of political review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function of political adjustment and dynasty change, etc. The thought of *minben* was intrinsically the spiritual power that championed the monarchic political model.

Key words: the thought of *minben*; the mass; political mentality; political culture

收稿日期: 2006-12-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历代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研究”基金资助项目（05JJD840005）。

作者简介: 张分田（1948-），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